

臺灣工業發展之父

朱開來

尹仲容死而未已(下)

(本文插圖刊第3頁)

水電開發奔走各省

關於尹仲容先生一生的事業，可以分作三個階段：(一)大陸時期。(二)來臺初期。(三)來臺後期。在來臺灣前後期之間，當中空白的二年，是他受訟累、在家讀書寫作研究的時期。

茲分別敘述如次：

大陸時期 民國十四年，仲容先生二十三歲，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那時的校長是凌鴻勳(竹銘)。由校保送入交通部任電政司職務。十九年升科長，隨擢幫辦。對電政與革特多，如制定電政制度，開闢全國長途電話網，郵電機構合設，都出自他的學劃。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籌建九省長途電話網。仲容先生初提出計畫時，以區域過廣，財才不勝，而被擱置。他懷於日本之侵略無已，力陳其重要，且以去就力爭。朱部長家驊為之動容，親往挽留，特予批准。因於長江沿岸及平漢、津浦、隴海三路所經地區，包括蘇、皖、贛、鄂、湘、川、陝、豫、魯九省長途電話網，始為興建，分隊架設，迅速完工，並購置價值五萬元之

無線電機，裝設於成都。其後，西安事變發生，南京能與洛陽通話，使叛亂得於短期內收平。及至抗戰軍興，搶運一部分至西南各省架設陪都與各軍區的通訊線路，使軍事通訊得以暢通，厥功甚偉。仲容先生於五十二年一月三日，在榮總病榻聞悉前部長朱家驊逝世時，感知己之恩，痛哭失聲，體溫增高，病情乃趨嚴重。先生固性情中人。九一八事變後，先生與沈君怡(怡)、王受培(崇植)、惲蔭棠(震)等三十多位有志青年，有鑒於國難日亟，必須自力更生，一切必須從正己做起，各自成為社會上的中堅分子，才能抵抗敵人的侵略，挽救民族的淪亡。他們由於觀點的相同，於是組織「正己社」作為精神的結合，以不談政治，專門研究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及相互砥礪廉隅的宗旨。曾先後在蘇州虎邱山、常熟虞山、武康莫干山、無錫馬蹟山集會數次。終先生一生，除參加這個「正己社」以外，從未參加任何其他黨派。但在到了臺灣以後，却為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所重用，信賴之專，得未曾有，這亦可以說是一種異數。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由朱家驊及霍亞民(寶

樹)之推介，出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協理。該公司董事長為宋子文、總經理為宋子良。營業範圍以協助並聯合政府機關，中外銀行及其組織，扶持公私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辦理關於是項之投資及管理，與信託公司之一切業務。先生所主持者，為民營給水與電力投資開發，對西安、南昌、漢口等大都市之水電事業，均予以創辦或改進，經常往來陝、鄂、湘、贛等地。

當時建設委員會將淮南鐵路售讓銀公司，該路由安徽田家菴南行至蕪湖對岸之裕溪口，全長約二一三公里，為一主要煤運鐵路。淮南煤礦為黃河以南重要煤區，日產煤千噸以上，灰分低，且可煉焦，長江以南浙贛、江南等鐵路及各電廠均賴其供應，先生對此路貢獻甚多。二十八年冬，赴美出任我國資源委員會國際貿易事務北紐約分所主任，辦理我國戰時所需國防物資採購事宜。全所職員僅三人，責重事繁，至感辛勞。

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在華盛頓成立，先生調兼該公司通訊器材組組長，主持戰時通訊器材採購業務。自此經常往來美京與紐約兩地，工作日形繁劇。

糧農會議皆大歡喜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派為我國出席聯合國糧食及農業問題會議代表，代表團團長為郭秉文，參加者共四十五國。先生於六月二十三日家書中曾稟告出席糧農會議經過：

「雙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此次聯合國在熱泉開糧食及農業會議，男代表我國出席。自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三日，計十七日，中間會同華盛頓一次，故山中共住約半月。此次會議主要目的，為表示聯合國內部之團結，故擇一不易發生爭端之糧食及農業問題，以為他項問題之肇始。結果，果不出所料，全體一致，皆大歡喜。其通過之議案，不外『提高生活程度，增加消費，擴大生產，減少國際貿易壁壘』，殆重申大西洋憲章及聯合國宣布之原則，不過將來如何可以實行此項原則，則各國利害不同，恐多爭論也。熱泉在維琴尼省，高出海面二千餘尺，風景清幽，而旅館設備甚佳，有野球、游泳等設備。游泳池水來自溫泉，尤為難得。山中幽徑甚多，每日晨起，輒散步一二公里。旅館房金每日五元，連飯食三餐在內，此為特別廉價，招待各國代表，尋常旅客，則每日房飯至少需十五元以上也。昨接亞民來電，謂湛英率諸孫已安抵吉安，想已啓程回湘矣。日寇經此次重創，想不致立即蠢動。前寄之維他命丸，亞民誤寄三弟處，不知伊已轉寄來未否？餘容後稟，敬叩 福安

男傭敬稟六月二十三日

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

結束，改組為中國供應委員會，由駐美大使魏道明兼任主任委員，梁敬錚任主任秘書，毛邦初任航空處，江鈞任兵工廠，王守敬任工礦處，王國華任交通處，劉瑞恆任衛生處。先生辭去兼職，專任資源委員會國際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職務。三十四年六月，先生自美國返國，供職資源委員會。是年冬，應行政院長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參事、贊襄機密業務，先後隨同巡視京、滬、平接收事宜，並協助策劃戰後主要生產與交通事業的恢復與建設，備具辛勞。

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回任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常務董事，再度主持該公司有關經濟建設的各項投資，同時兼任淮南鐵路公司執行董事。該公司承兵燹之後，鐵路拆毀殆盡，在經費支絀，器材缺乏的環境下，重振規模，對於當時煤炭的供應和交通的維持，貢獻很大。

來臺初期危機四起

來臺初期三十八年春，大陸軍事漸趨不利，尹先生奉母攜眷播遷來臺。六月，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隨改任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省主席兼任。所有一切政策與計畫的擬訂和推動，都由先生主持其事。這個機構名義上是管理生產事業，實際上則除生產以外，還包括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工程調配等重要工作。

從這裏不難看出，這實是一個以全面經濟為對象的決策、計劃與推動的機構。在三十八年時，臺灣到處都是二次大戰所遺留的殘破景象。所有重

要工廠、礦場、道路、電力，都因炸毀或無法維護保養而陷於停頓，僅有極少數的事業勉強開工。農業亦因缺乏肥料，對外市場沒有恢復而不能充分生產。至於對外貿易，因大陸局勢日益惡化，終至淪陷，對日貿易還不曾恢復，與外界陷於隔絕狀態。另一方面，則大戰期間物資缺乏之還沒有補充，又加上二百多萬陸續來臺的大陸軍民，使物資缺乏情形更為嚴重，物價上漲不已。這時臺灣的經濟，正是「一鳥孤懸，危機四起」的時候。尹先生乃當機立斷，迅即採取了下面幾項重要措施，遂使局面完全改觀。

一、凡能生產國防及民生必需品，外銷物品和進口代用品的生產事業，無分公營民營，一律給與原料、器材、資金等便利，使其恢復或擴大生產。遇有問題，片言立決，決定即行。決不敷衍推拖，毫無官僚作風。這亦即是「尹仲容作風」、「尹仲容旋風」。

二、積極恢復電力生產，供應工業需要。在當時外匯和財政十分困難的時候，動用一百萬美元，和三百萬新臺幣來完成烏來水力發電所第一批工程。這在現在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在當時美援未至，一百萬美元，幾乎已是竭盡張羅之能事，便可看出動用一百萬美元所需要的判斷和魄力。同時為了增加農業生產，又復千方百計自力建設肥料第五廠。

三、爭取對日貿易。仲容先生深知對外貿易對臺灣經濟的重要性，在三十八、九年時，尤知對日貿易對臺灣經濟的重要性，因此力主恢復對日貿易，並於三十八年十月成立日本貿易小組

，專門處理糖、鹽、和其他他銷日貨品的調配事宜。隨後於三十九年四月以經濟部顧問名義，飛往東京與盟軍總部談判雙方貿易事項，於九月簽訂「關於臺灣與被佔領日本間貿易協定」、「財務協定」，及「貿易計畫」，奠定了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這在當時來說，亦就是解決了臺灣對外貿易總額約百分之七十的問題。

尹仲容旋風到日本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先生致函譚伯羽，告以赴日簽訂貿易協定經過：

「伯羽吾兄大鑒：因接洽貿易協定及中信局歸還日債事宜，在日勾留一〇八日之久。九轉丹成，終於九日晨飛抵臺灣。除上二事外，代臺糖售糖八萬噸，其中六萬噸為一二八元五角；二萬噸為一七二元。中鹽十五萬噸，價九元，均為C.I.F.，經手逾千萬，未有一文入私囊，此則可為告慰故人者也。而此次對弟之忍耐性大有補益。然弟之癩直脾氣，亦大如S.C.A.P.之美人及日政商界所了解矣。回家後得讀七月間之長信，知在美一切安適，無任快慰。徐（學禹）（嚴（靜波））先後來美，臺灣情形，想甚明瞭。現在臺灣在軍事上應無危險，惟馬（馬歇爾）君上臺，不知政策有無轉變？『百年苦樂由他人』，我如不一心一德，發奮為雄，做些令人可以欽佩之事，終必無幸也。洪生因施濟元及沈鶴年兄之幫忙，可於本月十八日入西屋實習，生活費月二百餘元，當可自身維持，將來實習完畢，再讀一年書，即可回國服務矣。在日尚有二詩，寄呈斧正：

宿伊香保橋本社社

伊香保上溫泉好，浴罷溫泉夢易甜，
客裏不知身是客，浮生那得夢中歡。

答友

東京三月匆匆過，問我歸期欲說遲，
楓葉未紅秋未老，去來惟有寸心知。

大島赴伊東海上望富士山

富士籠輕霧，峯頭冠白雪，朝瞰窺
海（原詩下漏一字），照影自馨溫。

弟仲容上九月十七日

據尹仲容先生紀念集中立委張九如所寫的「仲容德行加工廠考察記」中關於他赴日簽訂貿易協定的經過，有如次的一段：

「尤其在三十九年間，河山僅餘半壁，美國已公布揚棄國民政府的白皮書，駐日佔領軍總部內主管經濟的麥克唐納與施幹克左袒日本，輕視我國之際，他僅以經濟部顧問的名義，借臺銀總經理瞿荆洲赴日商訂中日貿易協定，尤其力爭臺糖銷日合約，萬分不利的形勢，不但來自國外，並來自我國駐日代表團內，他竟不氣餒，一方面敢於拍桌抗爭，他方面又能熟察對方的真意，加以疏導，經三個多月的折衝，終使麥克阿瑟元帥及其僚屬，在敬佩他的機智與真誠之下，簽成合約，勝利而歸。在他死後，瞿荆洲先生對我談及此事，仍眉飛色舞，對他讚賞不置。」

胡光庶案嘔血消瘦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為中央信託局

貸款揚子木材公司案具呈先總統蔣公及陳誠故副總統等報告有云：「……惟維持工業，非出一己之私，而受資民營工廠甚多，亦不限於揚子，事實甚明。至所謂勾結牟利情事，則自省平生服政，向此不為，如對日貿易佣金四十餘萬美元，均涓滴留歸國用，何至在國內眾目睽睽之下，勾結一揚子？」

對日貿易佣金四十餘萬美元，即在今天來說，亦是個很大的數目，仲容先生均涓滴留歸國用，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如此的廉吏，竟硬說他與胡光庶勾結牟利，豈不是天大的笑話？豈不是給他最大的污辱？豈不是給他最大的打擊？怎麼會不令他頻頻嘔血，體重減輕二十餘磅？尹先生在生管會時期的擊剷推動，使公民營生產事業恢復的恢復，擴充的擴充，於是電力供應充裕，交通運輸能力提高，農工生產增加，對外貿易暢通。戰時工廠破壞，物資匱乏的跡象一掃而去，進一步發展繁榮的機運，也就隨之而起。

民三十九年十一月，奉令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中信局本是一個辦理信託業務，兼辦存放款匯款一般銀行業務的普通金融機構，可是一經先生主持，即高度發揮了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力量。他是一團火，到處發光、發熱，發生燃燒的作用，成為推動引擎的力量。

中信局當時在尹先生主持之下，有三項特別重要的措施：

一、執行代紡代織政策，以扶植紡織工業的發展。所謂代紡代織的主要作用，就是融通週轉資金。

二、籌劃創辦新竹玻璃廠。等到籌劃成功，立即交由民間經營。

三、統籌美援物資進口及政府物資的進出口。

因此中信局已由一個普通金融機構，成爲一個開發銀行兼國際貿易銀行，其業務活動與整個經濟活動息息相關，成爲政府執行某些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金融工具。

臺灣工業發展之父

關於中信局實行代紡代織政策，曾任美援會第三處王處長作榮在「今後工業發展的新形勢」一文中，給我們分析的很清楚：

「民國四十年前後，故尹仲容先生的徹底解決我們的衣着問題，斷然管制價廉物美的日本布進口，用代紡代織辦法，發展自己的紡織工業。織出來的布，品質既差，價格又高，一時『民怨沸騰』、『輿論譁然』，所有自由貿易，比較利益、通貨膨脹理論全部出籠，外加官商勾結，剝削消費大眾，爲少數資本家圖利的罪名，情勢不可謂不嚴重。但是請看二十年後之今日，我們的紡織工業，除了供應全國消費者價廉物美的衣着外，去年僅出口所得外匯便是四億二千七百萬美元，占出口第一位。此外，又有多少人依紡織業爲生，對國民所得的貢獻又是多大，目前全國消費者（也就是全體國民）從紡織工業所得到的又豈止是價廉物美、的衣着那一點點的利益而已。假如當年尹先生一經壓力便告屈服，不發展紡織工業，每年從日本進口三、五千萬美元的紡織品，就

像許多落後國家一樣，試想今日是何景象。今日我們發展重工業與高級工業之處境，就是二十年以前發展紡織工業之處境。今日紡織工業對國家、對消費者之貢獻，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後現正發展的重工業與高級工業對國家、對消費者的貢獻。我們這個社會可與樂成，不可與創始。」

王作榮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說：「如稱故尹仲容先生爲臺灣工業發展之父，實非過譽。」

尹先生主持中信局時，不但要積極推動發展本局的業務，就是不關中信局的事，他也要管，他這種「作風」，並非「愛管閒事」，而是爲了國家的利益着想。據曾任中信局秘書處長的周君亮，於五十二年三月在徵信新聞發表的「身後但餘書滿架——追記尹仲容先生」一文中說：

「……他在中信局局長任內，某次局務會報，他任主席，我適參加會報。席間有人提及某兩機關爲一次大批擄獲共匪物資的進口稅款問題發生爭議。尹說：『這筆稅款可以由中信局作保，讓貨物先行出倉再說，至於此批貨物應否完稅，以後總可以弄得清楚，不要讓貨堆在倉庫中爛掉了。』那一筆相爭的稅款，數額在千萬以上，事件與中信局完全無涉，中信局既無義務也未奉命解決那個爭端，但尹先生却毅然在局務會報上提出由局作擔保。……尹先生打算拚起這個與他無關的責任，而且他這樣幹，却並非爲了中信局一局的利益或表現。」

郭紫峻質詢揚子案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生管會結束。行政院設

立經濟安定委員會，尹先生受任爲委員，並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生管會原有關於工礦生產計畫工作併入辦理。接任後，即着手釐訂新工業政策，訂定第一次四年計畫中的工業計畫，統籌工業美援的申請與運用，統一調配國內美援工業資金。現在臺灣稍具規模的現代工業如玻璃工業、紡織工業、人造纖維工業、塑膠原料工業、水泥工業、肥料工業、煉油工業以及電力海陸交通運輸等，不是在這個時期籌劃設立，就是在這個時期擴大改進。臺灣工業經過這一段的努力，已經由恢復舊工業的階段，進行了發展新工業的階段。因此整個經濟受到工業發展的影響，呈現繁榮與穩定的現象。四十三年六月，出任經濟部部長。仍兼中信局局長及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但實際執行部長的職務不到一年。在這短短一年內，他仍做了左列重要的工作：

- 一、貫徹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執行水泥、紙業、農林、工礦四大公司移轉民營的工作。
- 二、籌劃興建石門水庫、規劃大甲溪開發計畫。
- 三、推行輪灌制度。這是對農業方面的一大重要貢獻。
- 四、着手發展遠洋漁業。
- 五、加強軍公民營工業聯繫，並增建倉庫，儲備物資。

四十四年春，正當仲容先生埋頭致力於經濟全面發展的時候，立法委員郭紫峻，突於三月十五日，在立法院院會中，向行政院院長馮鴻鈞提出質詢「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該公司董事長

兼總經理胡光廬，其間涉及中信局業務。上項質詢提出後，行政院於當日下午立即令飭中央信託局、臺灣銀行、美援運用委員會、農民銀行、國防部等，就其各與揚子木材公司有涉之事實真象，作成詳細報告送院，以便研議答覆。

俞院長於三月十九日手令司法部：「關於揚子木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胡光廬連續騙取國家財物一案，及各有關主管辦理機關人員有無瀆職舞弊情事，交該部轉飭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法偵查辦理具報。」

同日，尹先生向行政院辭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兼局長及經濟部部長兩職。

監院檢舉貸款弊端

從此，該案進入複雜漫長的司法程序。

四月二十八日，監察院監察委員張國柱、陳嵐峯，以先生及周賢碩辦理貸款墊款，弊竇叢生，致公帑蒙受重大損失，違法失職，特依法提案糾舉，經監委趙季勳等審查成立，移送行政院依法辦理。

同時，臺灣省工業界人士林雲龍、唐傳宗、李占春、顧欽賢、何義、林挺生、許金德、林柏壽等數十人，聯合呈請各有關當局，懇懇對胡光廬案處理時，應以國家建設及經濟安定為重，毋令勇於負責之主管人員，蒙受冤抑。茲節引原呈要點如下：

「閱報載：揚子木材公司胡光廬案，經濟部尹部長因在前中信局長任內貸款該公司之責任問題，接受最高檢察處之偵查，最近復受監察院彈劾。民等對該案內容未盡明瞭，深信司法當局定能作公正之判斷，自然無庸妄置末議。惟尹部長自民國三十八年多負責前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及現在工業委員會，即與本省工業界時相接觸。四十二年出任經濟部長，更為本省工業政策之直接執行者。故尹氏六年來之政績及其對於本省工業之貢獻，民等均有深切之體驗與認識：諸如本省過去缺乏紡織工業，布疋均賴由日本輸入，自得尹氏之極力鼓勵，紡織工業突飛猛進，不僅本省所需全部供給，且能開始外銷；他如電力、肥料、鋼鐵、麵粉、化學、水泥、電工器材、榨油、自行車、橡膠、造紙等諸工業，亦均有長足進展，得尹氏輔導之功為多。又尹氏才識卓越，處事果斷，不避勞怨，勇於負責，尤能不分省籍，不分公營民營，不偏不倚，一切以國家之利益為前提，這種公忠體國之作風，深為民等所欽敬，亦為大多數同胞所愛戴，事實具在，舉省皆知。倘因此便利他人之圖利，而疑其有瀆職之嫌疑，則將使賢者灰心，敵人快意，大家袖手無為，以推諉為能事。民等對尹氏個人清廉自守，尤所深知，倘其果有營私舞弊情事，民等何敢為之左袒，伏呈鈞座衡量全局，念其勞瘁，以本省工業為重，以國家建設為主。」

我們讀了這篇為尹先生辯白的呈文，不禁覺得公道自在人心，自在民心。

經濟部長一再被傳

揚子公司胡案，自最高檢察署偵辦告一段落後，已於五月三日發交高等法院檢察署轉交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處依法辦理。先生曾一再被傳，有時至深夜始歸，七月二十二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列先生及胡光廬、周賢碩為被告。八月十五日，臺北地方法院首次開庭調查庭審理胡案，先生出庭應訊。除呈遞書面辯訴狀外，復提出口頭說明。其要點為：

1. 扶植民營事業是不是政府一貫的政策呢？
2. 政府扶植民營工業的政策，在當時的臺灣，是不是格外有急迫的需要呢？
3. 中央信託局是不是執行扶助民營生產事業的機構？
4. 就揚子公司的當時情形來說，是不是應予扶助呢？
5. 我在處理揚子貸款案時，有沒有徇私或圖利胡光廬呢？
6. 那麼，中信局借款給揚子公司，究竟有沒有使國家遭受損失？
7. 中信局對揚子公司欠款為什麼不訴追呢？

十月三日，上午八時半，臺北地方法院刑庭審理胡案。下午二時，開始辯論。至九時半，宣告辯論終結，定八日宣判。

十月八日，臺北地方法院以胡案一部分事實，未盡明瞭，尚須調查，經裁定再開辯論。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臺北地院刑庭，對胡案重開辯論。下午二時，宣告辯論終結，定三十一日宣判。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臺北地院宣判胡案三被告無罪。並准胡光廬交書面保十萬元停止羈押（計已羈押七個月零三天）。

此案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但最高檢察署一再電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轉飭臺北地院檢察處提出上訴。

十一月十一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對胡案奉命提出上訴。

四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先生向臺灣高等法院呈遞辯訴書。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臺灣高等法院刑庭推事三人，組成合議庭審理胡案，並開始辯論。至午後四時半辯論終結，定期本月二十九日宣判。

二月二十九日，臺灣高等法院宣判先生及周賢碩、胡光庶均無罪。

體力健康備受損傷

本案至此始真正結束。自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立法委員郭紫峻提出質詢，俞院長交最高檢察處偵辦，以迄法院二審均宣判無罪，前後共經十一月餘，被傳訊問數次，精神體力健康，備受折磨損傷，雖處拂逆窮困之境，仍然從事讀書寫作研究，不改其志。在訴訟期間，友人願意幫助訟費，均遭其拒絕。商人要接濟他貧窮的生活，也被他揮出家門。有時他深冬寒夜赴法院應訊，因袋中空空，祇好步行往返，以致勞累鬱憤而嘔血。但絕不向命運低頭。此一時期，他常到植物園中央圖書館蒐集資料，準備編纂郭筠仙年譜，以蠅頭小楷寫了三萬字左右，另手錄的資料共八百餘頁，約四十餘萬字，但終未完成。按郭嵩燾為清代名臣，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道光年間進士，光緒間任出使英、法大臣。郭不識英、法文字，但對異邦國情觀察甚深，歸國後力主改革，曾受時人的指責。奉使三年，取諸公者，

惟薪水屋租二事。仲容先生爲什麼要給郭筠仙編年譜呢？他認爲郭是當時第一位具有世界智識的人，膽識才華，遠在曾左胡李之上，可是他的抱負，因爲曲高和寡，並沒有能够實現。他同情郭的遭遇，所以要爲他編寫年譜。但是仲容先生的才華與事功，都要超乎郭筠仙之上。尹氏逝世後，治喪會曾輓以「志節抱武鄉侯之忠，平生以郭嵩燾自況」，實爲確切之事實。

來臺後期經過兩年多的退隱，終於復出。

四十六年八月，政府起用尹先生爲經濟安定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四十七年三月，兼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外貿會組織規程並經行政院修正，主任委員不再由財政部長兼任。

四月十二日，行政院正式公布「改進外匯貿易方案」及「外匯貿易管理辦法」，是爲政府自四十年四月宣布經濟金融新措施又一重大改革。

臺灣外匯貿易政策，爲兼顧經濟穩定和經濟發展，一直都是採取複式滙率和嚴格的進口限額制度。這在通貨膨脹，外滙短缺，經濟建設還沒有充分發揮效果的時候，自不失爲一對策。但是到了四十六、七年，情形已有所轉變。經濟漸趨穩定，外滙準備日益增加，經濟建設效果逐漸顯著。需要有一個單一的、切合實際的滙率，和較自由的貿易制度，使國內外經濟關係逐漸恢復正常，並爲國內正在發展的工業謀一出路，轉而刺激進一步的經濟發展。而另一方面，則複式滙率與嚴格管制下的貿易所產生的許多弱點，特別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如外滙牌照的頂讓，也需要加以革除。

兩年退隱再創新猷

這時，仲容先生又一次發揮了他當機立斷的能力，和勇於任事的精神，以明快的手腕，循序漸進的方式，自「改進外滙貿易方案」公布後，對外滙貿易做了一連串的改革：(1)調整滙率，使接近新臺幣的真實價格。(2)實施單一滙率。(3)取消進口物資預算，和貿易商申請限額辦法，並簡化申請審核手續。(4)外貿會業務重心由進口管制轉變爲出口發展。當時有人對貿易商可以自由申請外滙，取消限額的辦法提出批評，尹先生毅然表示：「如果攙垮外滙，我一個人負責好了，絕不牽累他人。」可見其任事之勇。

在這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下，刺激了出口貿易，因而刺激了整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工業發展。穩定了進口貨品的價格和供應量，消除了行政上的困難和不健全現象，正常化了臺灣經濟的內外關係，建立了臺灣對外價值的信譽，穩住了美鈔黑市，美鈔黑市且曾一度消除，並使外滙準備逐年增加到七千萬美元之多。這與三十九年底約有一千萬美元的信用狀不能兌現的情形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據七十六年七月三日新聞報導：日本大藏省指出，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底的外滙存底達六百九十二億七千三百萬美元，是日本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另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日本的這項紀錄，業已超過外滙存底居世界第一位的西德，而爲世界之冠。西德的外滙存底爲六百六十四億美元。至於我國的外滙存底，據保守

的估計，到本年六月底爲止，約在六百一十億美元以上，將占世界第三位。這較之當年七千萬美元的外匯存底，增加幾近八十七倍。如以人口的比例來算，則不知較大陸相差多少倍了。當年外匯枯竭，固然令人頭痛，現在外匯累增過多更是令人頭痛。如果尹先生今日仍然健在，就會靈活運用，而不會頭痛了。

民國四十七年九月，經濟安定委員會撤銷，部份業務併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誠院長兼任，尹先生兼任副主任委員。四十九年七月，又奉命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集外匯貿易、美援、金融三大要職於一身，責重事繁，每天奔走三大機構之間，毫無休息，絕非常人所能勝任。而先生處理不紊，勝任愉快。真是「六轡在手，屹立如山」(治喪會祭文中語)。謀定而動，動必有成。

尹先生每負責一個新的機構，他必定積極的推動擴大其業務的發展。美援會本是一個處理美援的純業務機構，先生到職後，即切實作進一步的規劃，對外則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詳細計畫，爭取美援，國際開發協會援助，和國外人投資。對內則運用美援和其他外來資金，協助執行政府的財經政策和計畫，推動公民營生產事業的發展，和社會教育事業的改進。四十八年底，並會商有關財經首長向政府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和加速經濟發展計畫，由政府採納後施行，並得到美方的完全贊同。同時，在美援會下設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主持改善投資環境和洽商外資事宜。

一島孤懸經濟大國

爲達成加速經濟發展目標，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政府決定採取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這也是尹先生復出後，繼「改進外匯貿易方案」後又一重大改革，關係今後臺灣經濟發展至鉅。

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其主要內容包括：

(1) 經濟發展 1. 鼓勵儲蓄節約消費 2. 資本市場 3. 改善民間投資環境

(2) 預算 1. 支出方面 2. 收入方面 3. 預算制度

(3) 金融

(4) 外匯與貿易

政府對外匯貿易改革之目的，在建立單一匯率制度，並視國際收支情況之許可，儘量放寬貿易管制，以求恢復新臺幣之能自由匯兌。

對於促進進出口方面，應從擴大鼓勵措施、簡化出口結匯手續，加強與國外之商業接觸等多方面努力，謀求出口之進一步發展。(計劃可能實現之日期……長期努力)。

從今日來看，除租稅制度、稅務行政及部分國營事業尚有待繼續改革外，其餘各項可謂均著績效，尤以外匯貿易方面最爲突出。如三十九年時，出口值僅爲九千三百餘萬美元，至四十八年已增至一億六千餘萬美元，自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每年均爲入超。三十九年入超爲二千九百六十九萬四千美元。到了去年(七十五年)，出口值已增至三百九十七億八千九百餘萬美元，三十七年間，共增約四百二十七倍有餘，今年當尚不止此數，成長速度不可謂不快。最初十年間，每

年均爲入超，其後各年亦以入超爲多，自六十五年開始，至七十五年，這十一年來，每年均爲出超，而且出超金額愈來愈大。六十五年時，出超金額不過五億六千七百餘萬美元，到了七十五年，突增至一百五十六億二千四百餘萬美元，今年當更爲增加。以致外匯存底到今年六月底止，已突增至六百一十億美元以上，引起外匯存底過多，不知如何運用的嚴重問題。美國人看了眼紅，不斷施以外交壓力，迫使新臺幣不斷升值，一年多來，新臺幣升值已接近百分之二十五，美國人還嫌升得不够多。美國在財政赤字、貿易赤字逐年擴大以後，出口貨品失去競爭力，不思力求改進振作，反而採取保護措施，報復手段，與二次大戰後大力援外的雄風相比，想不到竟淪落到這種地步！大戰後戰敗國的西德、日本，現已成爲自由世界經濟大國，排名第一、第二的地位。臺灣雖爲一小島，但亦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如果仲容先生現仍健在，又豈僅爲四小龍之一而已！

打起精神做份內事

尹先生就任臺灣銀行董事長後，採取謹慎的金融政策，對信用膨脹有所限制。這時的臺銀還在代理中央銀行業務時期，是實際的中央銀行，因此他的主張，遂得親自實行。這種緊縮的政策，在部分過慣了通貨膨脹生活的工商界，自然不爲之動，然而先生仍然一貫的擇善固執的態度，不爲之動，並不嫌其煩的向工商界解釋。以後經濟的更趨安定，外匯貿易改革成就得以維持，新臺幣幣信的不斷提高，先生的堅決主張與實際作

爲，自然是很重要的力量。在仲容先生主持臺灣銀行期間，準備發行百元大鈔，引起各方嚴厲的批評，認爲會引起通貨膨脹，影響物價。這班人由於大陸時期通貨膨脹的恐懼，以爲臺灣發行百元大鈔，將會步大陸通貨膨脹的後塵。其實尹先生是經過深思熟慮方有此決定，決非貿然從事。他在立法院答詢時一再的表示：

「這是我一個人的主張，要是影響物價，願引咎辭職，受一切處分。」

誰會想到以後竟有千元大鈔的出籠。時代在變，豈可墨守成規。

中央銀行於五十年七月復業以後，臺銀代理央行業務除小部分外，都移還於央行。先生立即將臺銀的業務重心，轉變爲協助臺灣生產事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又和從前任中信局局長時一樣，使臺銀成爲一個促進生產與貿易的重要工具，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力量。

任何一個機構，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筆錢，一到先生之手，立即成爲促進經濟進步的有力工具，功效立見。在臺銀如此，在美援會如此，在外貿會如此，在生管會更如此。先生爲什麼要這樣公爾忘私，全力以赴，「赴義恐後」呢？這乃是他鑒於大陸沉淪，國步艱難，乃奮其孤忠，効忠國家，早置名利生死於度外，只要能有一絲的貢獻，決不畏縮退後，而勇往邁進。我們從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紐約寄家書中早可見其志節：

「雙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五日所上一稟，不知收到否？譚伯羽兄想已達到，此間情形，

當已知悉。另於十五日赴外參觀工廠，因紐約有要事須接頭，故先期而歸，失此機會，頗覺可惜也。近來各方戰局均好轉，德國在五月間或將崩潰。日寇失去菲律賓後，海運斷絕，必利用公路爲供給線，將來從南洋退兵，亦必利用此線。屆時我國戰局或反倒吃緊，亦未可知。不過日趨光明，則自然之理。所望我國上下發奮爲雄，勿再失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另常謂我國近代稀有之機會甚多，皆交臂失之。戊戌維新，以慈禧之爭權失之。辛亥革命，以袁世凱之野心失之。第一次歐戰，我國原可發展實業，以軍閥之內戰失之。十六年北伐，以共黨之搗亂失之。現爲第五次矣。八年抗戰，顛沛流離，正不知犧牲多少生命財產，才換得今日之局面，如再失去此機會，則真可惜矣！惟天既與我國以五次之良機，則終欲玉成於我，斯則令男與奮無已。惟默察對會之一般人心，則覺更趨沒落，此殆皆戰時不安心之心理，希望戰後入軌道後，能有所變更也。另近來身體時時不適，頗有『不業多病聰明減，詎慣長閒意氣消』之概，故現仍打起精神做分內之事，以冀於國有益也。大人身體近來如何？尚祈時賜手諭，以慰遠途爲禱。敬叩 福安！

男國壻敬稟一月二十二日

仲容先生對我國近代史的分析，至爲正確。抗戰勝利，爲我國第五次之稀有復興機會，但仍由於中共之全面叛亂而失之。先生痛心之餘，退遷臺灣，主持經濟殘破之局，慘淡經營，銳意革新，不眠不休，殫精竭慮，流汗流血，全力以赴，終於開創臺灣經濟發展之奇蹟，引臺臺灣經濟

起飛之前途，掌握我國第六次復興之機會，奠定光復大陸，統一中國之基礎。並成爲世界落後國家經濟建設之楷模，即中共亦要「經濟學臺北」。豈即先生在家書中所謂「天與」之乎？可惜蒼天未假以年，否則成就豈僅止此而已。仲容先生既已奠定臺灣經濟起飛之基礎，由於體力透支過度，已到油盡燈枯，身心衰竭，全身是病，肝肺俱裂的地步，終於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晨醫藥罔效而長辭人世，死不瞑目，死而未已也！噩耗傳出，識與不識，莫不爲此一代之忠臣，一代義士，一代英豪，並世難逢之巨人而飲泣也。

回憶在尹先生安葬後的第二年深秋，一個星期天的午後，筆者曾偕內子至陽明山第一公墓，到先生暨石太夫人墓前行禮致敬。追思以往四年受教的經過，一切印象如在眼前。人生如夢，感傷不已。歸途忽陰霾四合，秋風落葉，冷雨綿綿，滿面霧水，不知是雨？是淚？而今內子已因癌症纏綿病榻三載有餘，終於年前逝世榮總。老年喪偶，形單影隻，故舊凋零，淒涼寂寞，談笑無伴，往來乏人，一年病痛，惟賴藥物以苟延。滿懷鬱結，豈可藉水酒以澆愁？有鑒今日臺灣富裕繁華，但財經動盪，處處被動，缺乏領袖人物，高瞻遠矚要角，不若過去領先革新，衝刺邁進。至感隱憂。而一般多數青年後代，不知今日之享受，乃係先賢生命換來之果實，不思吃苦耐勞，奮力前進，以先賢作榜樣，繼承遺志，完成復興統一之雄圖，至深慨歎。「人之將死，其言亦善」。此乃余病中爲仲容先生寫此文之愚意也。

七十六年七月七日